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 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

李德团 陈盈伊

摘要: 研究对22位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进行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新阐释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与日常反抗路径。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算法控制”的伪装正义,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但这背后隐含其对收益追求和身心焦虑的反抗意蕴,具体体现为:“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三种日常反抗路径。重思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可以发现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弱者的日常反抗存有差异:内容创作者的生存伦理问题已从弱者反抗的普适性走向了灵活性;日常反抗从弱者的消极争斗转变为积极争斗;“剧本边界”破除需要从弱者的底层政治提升至平台的国家治理。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关键词: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同意制造;日常反抗;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443(2023)06-0019-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XW063);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1WTSCX062)

一、引言

相较于传统劳动雇佣关系的全职工,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完成数字平台碎片化任务的“数字零工”最大程度满足了新兴经济模式的供需^[1]。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知识技能分享型领域在零工经济市场规模中位列第三^[2]。Quest Mobile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用户对抖音、微博、B站等内容平台依赖性明显增强,用户对内容平台的使用习惯影响消费品牌的营销布局,促进KOL网红经济的繁荣^[3],再加之平台内容激励机制,内容创作者日渐兴盛。这是一种区别于低技能的“数字零工”,专注于产出创意内容的劳动者,被称之为“数字灵工”^[4]。内容创作者最初多以兴趣爱好为由开始创作,随着平台激励和品牌广告投放,创作者逐渐发现内容可以变现,部分内容创作者便将该兴趣爱好转为职业工作^[5]。在这份“无劳动合同”的工作中,创作者不仅可以从与其他用户的互动中获得情感满足,无学历、技术门槛限制以及工作时空的自由,促进他们认可“内容创作”这一劳动。与此同时,不同平台推出“流量为王”的考核机制与“内容为王”的创作计划,让创作者认同“流量”作为劳动考核标准是透明的,“内容至上”是创作者获取更多流量的必然要求。

但由于内容创作者对灵活就业的不安感,逐渐对平台产生黏性劳动,即为了能够维持稳定收入而提升内容质量,提高内容更新以及广告合作的频率,实则为平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当创作者与平台资本“利益”关系失衡时,创作者会通过衡量不同平台利益,进行生产转移,但本质上仍受平台

的劳动控制。与此同时,无边界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导致创作者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平台可以实现不在场的劳动控制。表面透明的“流量”机制,实则控制在平台资本中,创作者只能趋于平台算法和用户偏好进行内容产出,进而催生出自发的“赶工游戏”^[6]。

因此,尽管内容创作者在看似公平的劳动过程中,默认了平台的劳动控制,但收益不稳定、受制于平台、算法控制内容可见等问题,使创作者只能通过日常的反抗来平衡自身与平台资本的关系,这突出表现在:内容创作者试图发觉平台漏洞进行反抗,但反抗行为会被平台技术所“盗猎”,成为进一步严密且隐蔽的控制方式,这是一套流行于创作者群体中的“潜隐剧本”,内容创作者拿起的仅是“弱者的武器”。

詹姆斯·斯科特关注到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非正式反抗和底层意识形态,揭露了底层人民与掌权者间支配与抵抗中复杂又微妙的关系,提出“弱者的武器”“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概念^[7],与网络时代的“数字灵工”时代境遇十分相像,两者均处于资本的底层,但均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认识到自身的境遇,选择“日常反抗”这一“弱者的武器”来维持生存。内容创作者往往通过自建的社群后台,暗地表达作为受控者对平台资本的批判和不满,成为“潜隐剧本”。遗憾在于:目前部分国内文献虽认为内容创作者的反抗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8],进行微弱的抵抗,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9],但并未围绕这一理论展开对话,仅仅是对理论的简单“挪移”或“相遇”。有研究者对处于“第四世界”的马拉维盗版电影研究中的“弱者的武器”的全球“适用性”进行讨论,认为“盗版”这一“弱者的武器”正是“低端全球化”在全球影视行业中的具体体现^[10],对其理论适用于中国平台化语境分析还有待拓展。

综上,本文从斯科特的理论出发,认为内容创作者在认识到与平台的不对等关系后,会权衡反抗需要付出的代价,相较于正式大规模的反抗行为,更倾向于日常化、象征性的反抗,这是符合创作者节点化、匿名性等结构特点能够长期存在的抗争运动。同时该理论从意识形态和权力格局讨论弱者的遵从性,这与本文研究内容创作者的“数字劳动”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随着平台媒体化与媒体平台化的趋势盛行,目前内容创作者多是基于平台型媒体进行创作,内容创作进入平台时代,故本文选取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而言,本文继续沿着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这一基本思路,以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思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与平台的劳动关系,研究以下三个问题:重新阐释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在劳动过程中何以形成“同意制造”的机制;处于弱势的内容创作者面对强大的平台,将如何展开日常反抗路径以维系生存;基于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反思底层弱者与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行为有怎样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适用性

(一)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与反抗主题

随着平台媒体化与媒体平台化的双向融合,“平台型媒体”成为主流模式^[11],内容创作者成为平台型媒体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平台天生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通过算法技术作用于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实施隐性的劳动控制,成为研究者从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劳动控制的基本面向。布洛维的劳动过程理论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工具,拓宽了研究者对数字平台如何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理论阐释^[12],经典的“赶工游戏”单一的工场劳动控制逐渐演变为“老板游戏”“情感游戏”“性别游戏”等多样的平台劳动控制^[6]。

国内研究者指出内容创作者深受平台的劳动控制,由此形成自由与妥协的“同意制造”意识、自雇与自由的“赶稿游戏”隐喻,深刻反映出包括内容创作者在内的平台劳动既可以是弹性劳动,亦可以是黏性劳动^[13]。但是,劳动过程从来就不仅是“制造同意”,亦会“制造不满”,蕴含反抗行为^[14],国外学者对影视创作者^[15]、自由记者^[16]、数字平台记者^[17]的研究表明:内容创作者在平台劳动过程

中的不稳定性虽制造了表面的同意,亦暗含幕后的反抗,有研究者亦发现职业摄影师存在参与或抵制平台工作的矛盾心理,即便是自由摄影师亦存在明显的反抗现象^[18]。根据现有文献,内容创作者的反抗策略大致表现为:一是展开去中心化集体行动(decentralized collective action),改写平台工作规则^[19];二是组建网红互助小团体(engagement pods),摆脱平台算法控制^[20];三是联合实施“平台合作主义”,削弱平台资本主义^[21]。摆脱平台算法控制成为平台创作者反抗的普遍诉求^[22]。

然而,目前的文献多限于一两个平台的劳动控制研究,对不同平台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平台迁移关注尚有不足,且多集中于算法控制劳动的反抗讨论,有研究者甚至将持续的策展算法(curation algorithms)建构的社会权力视为一种算法元资本^[23],但平台算法操纵的背后推手是平台资本。平台资本对内容创作者可见性的控制、赢利机会的获取,流量数据的不对称性以及创作者对平台的强烈依赖、创作者的激烈竞争等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二)“平台型媒体”的同意制造与用户的劳动关系

要理解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以及由此带来的平台社会化,需要从基础设施、治理、实践三个维度入手^[24],有研究者主张通过探索不同空间层次的国家市场动态,以区域性和历史性的方法来研究平台和平台化的中国时空脉络^[25]。5G、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互联网传播格局的演变,各个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推出能够联系用户和内容的“互联网+”应用,这些应用延伸了互联网原本作为工具的内涵,使应用发展成基础信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成为“平台型媒体”^[8]。

平台型媒体为所有参与平台的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生产渠道,技术门槛的降低,激活了“个体”的传播活力,改变了传统以机构为主的传播体系。凭借流量开放平台,个人、商业或非商业利益组织形成诸多信息节点彼此联系,利用平台赋予的发布权力进行内容生产,以自身的时间、技能作为内容生产能力,在社会协同中实现内容增值^[11]。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成为商品数据,以获取数字资本^[26],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与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融为一体,成为数据生产的领地和资本剥削的对象^[27]。

因此,在分析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中,需要肯定其主观能动性,以及与平台方存在的劳动雇佣关系,并借此探究数字劳动过程中平台数字化和资本剥削的途径,分析“数字灵工”的“同意制造”何以可能,进而分析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反抗意蕴。相关文献从雇佣关系、工作环境、情感劳动、隐蔽控制和资本增值等方面对内容创作者“同意制造”过程进行了研究。

从雇佣关系及工作环境来看,内容创作者与平台处于“非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媒介技术模糊了娱乐和工作、兴趣与劳动的边界,工作时间和空间变得分散化、个人化^[4]。在情感劳动方面,内容创作者最初的创作动机多为兴趣所致,但全职内容创作者逐渐注重如何将“兴趣”内容进行变现,他们对平台资本的剥削机制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不能阻碍内容创作变现的积极性^[28],在情感劳动作用下,构成内容创作者对平台劳动的同意^[8]。

从隐蔽控制来看,平台通过对劳动者意识形态的控制,宣传“平等致富”“内容至上”等观念形塑劳动者的主动同意,将梦想与内容变现联系在一起,激励内容创作者为美好的梦想图景^[8],主动且自发地过劳参与平台劳动。互联网内容传播逻辑的转变导致平台型媒体的经营方式也与传统媒体不同,从以往的“版面”“时间段”价值转变为“注意力”“流量”价值^[29]。在资本增值方面,平台通过在技术层面引入“流量”制度作为薪酬评价体系,算法技术介入内容分发和收益评估,以人工为辅、算法为主的评价体系,为内容创作者营造一种公开透明的感知,制造出对平台劳动机制的同意^[8]。

综上,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为了获得灵活就业的机会,放弃了部分主体性,同意平台所设置的劳动机制。在意识到平台资本剥削的本质后存在一定的反抗可能,但作为节点分散的创作者,即使是进行多平台的迁移,亦无力与平台进行直接反抗。因此,在分析数字灵工“同意制造”的劳动过程,更需要重视创作者所使用的“潜隐剧本”进行的日常反抗。

(三) 日常反抗的理论阐释与适用性分析

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的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30]。国内社会抗争研究范式可划分为:揭示驱动力量的“情感范式”、探究策略手段的“工具范式”以及考察抗争社会环境的“结构范式”三大类型^[31],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理论为日常反抗理论。日常反抗的理论脉络至少有两条:一是空间脉络,由列斐伏尔开创的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理论,由此形成了福柯的空间权力规训和塞托的日常消费战术反规训等日常实践反抗^[32];二是时间脉络,工人表现为一种“人格化”了的劳动时间,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事着一种“异化劳动”^[33]。互联网产业不过将网民的传播行为转化为商业资本增值的数字劳动,由此完成网民时间的殖民化与社会空间的工厂化^[34]。福柯的文化权力强调权力对人的主体性消解,赛托的文化实践反叛着眼于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的控制^[32]。然而,内容创作者并非被动地接受平台的空间规训,其劳动时间亦灵活富有弹性,不仅生产创意内容,还要渴望用户对内容的消费实现其变现的目的,在平台“劳动同意”的背后蕴含着反抗意识,且要不断进行日常反抗以获取收益,而非革命式、群体式的社会抗争。因此,对内容创作者的研究需要回到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所谓日常反抗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也是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30]。

具体而言,“弱者的武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分别来自斯科特的两本著作《弱者的武器》和《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通过对东南亚底层农民的研究,斯科特将底层农民(从属者)对支配者(掌权者)的抵抗隐喻为可见光谱外的“红外线”,认为这是在长期的霸权研究中被忽视但却真实存在的底层政治表达。

1. 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以往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重视大规模的正式运动,而忽略了非正式、无组织的日常形式反抗斗争。相对后者而言,前者的反抗是稀少且能轻而易举被击败,而后者才是适合农民社会的结构和特点,能够长期存在且具有颠覆性的运动^[35]。斯科特通过“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批判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指出底层农民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认识到自身的处境,综合考虑正式反抗需要付出的代价,主动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以维持生存。

2. 日常反抗分析:“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

斯科特在《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中区分了从属者与支配者共有的“公开剧本”(open transcript)和“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两个分析概念^[36],前者主要指支配者在前台与从属者之间展开公开的互动;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后台,既包括从属者暗地对权力的批判和不满,也包括支配者对难于公开表明的主张和实践,但更多的是指从属者基于支配者的权力限制产生的非正式反抗。可以说,“潜隐剧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剥夺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弱者的武器’”^[37]。《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的导读者郭于华指出:“新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为‘潜隐剧本’疏通了渠道,建立了平台,使得从属者能够以表达主体的身份进行灵活多样、充满智慧的表达。”^[37]

3. 理论的适用性

考虑到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基于东南亚底层农民的实践经验,与平台社会内容生产者境遇不同,本文决定以萨义德“理论旅行”为研究旨趣实现理论的接合。萨义德认为观念和理论跟人和批评流派一样,也会在人与人、情境与情境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38],本文既要运用斯科特的关键概念展开新现象的分析,亦欲展开与斯科特的理论对话,以思索斯科特日常反抗“理论一路旅行下来,其核心观念是得到了强化还是日渐衰竭?”^[39]。斯科特的理论尽管是研究农民日常反抗,但理论旅行早已突破“底层农民”的人群范畴,走向“底层弱势”的政治隐喻。然而,理论旅行可能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创造性的借用,抑或全盘的挪用^[38]无法否认的事实,有必要重审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首先,底层弱者的日常反抗通常基于其生存伦理。在面对掌权者时,不是直接对抗,而是采取隐蔽方式,这种反抗意识对于底层弱者而言是独立且统一的。而底层弱者的潜隐剧本正是隐蔽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通过日常话语和实践有效避开统治者的监视和打击^[37]。在平台时代,作为“灵工”的内容创作者与作为底层的农民具有相似的底层逻辑:就像农民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源索取对象,内容创作者亦是任何平台资本的数据提取对象,从属于平台系统,甚至在平台的“公开剧本”宣传中找到创作兴趣入场平台,在劳动过程中受制于平台规则影响,很难直接、公开地抵抗平台,否则将面临生存窘境。

其次,从属者“潜隐剧本”的日常反抗有共通之处。例如内容创作者大量存在的对“敏感词”处理行为,通过语言使用和意义制造以能够被底层群体所识别和分享的形式进行编码,从而使文本处于权力的巡查和监视之外,这种不反对平台方“公开剧本”而背后悄悄处理的“潜隐剧本”做法是一种话语及实践策略,避开了平台掌权者的直接监视,从而达到某种沉默的共谋,这与底层农民对“公开剧本”的表演性策略不谋而合。

最后,对“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的理论回应。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在网络空间不再局限于平台之内的后台空间,亦可以是平台之外的特定空间,媒介技术既模糊了前后台的边界,亦使平台掌权者和内容创作者的关系变得模糊,回应了斯科特“公开的与潜隐剧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地带”^[37]。有研究者指出:内容创作者面对平台的绝对力量,亦可以通过平台迁徙,利用规则漏洞,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8]。

虽然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体系在国内学术界的理论旅行较为兴盛,但显然学术界对“弱者的武器”运用远超“潜隐剧本”。事实上,斯科特本人也承认《弱者的武器》(1985)是其最引以为傲的著作。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1990)探讨的是《弱者的武器》属下群体的行为以及权力背后的真相,而后《国家的视角》(1998)讨论国家知识的形式^[40],斯科特的理论体系带有明显的国家治理隐喻,这与本文力图从内容创作者切入,管窥平台资本背后的掌权者权力,进而反思日常反抗的式微,呼唤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在隐喻层面是相通的。

当然,斯科特日常反抗理论的理论旅行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反思,如国内著名学者于建嵘与斯科特那场关于“民众反抗与政治”的对谈^[41]。O'Brien 和 Li 认为中国农民的抗争已不再是日常抗争,而是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42]和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43],于建嵘则认为农民抗争已经进入了“以法抗争”阶段^[44]。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虽然具有底层政治的意蕴,但其对中国农民抗争领域的解释力不足,反而使得该理论能够外溢至包括平台研究在内的其他领域,实行了理论旅行的“边界突破”,不过,这也提醒了我们:在运用外来理论时,简单的拿来主义并不能完全实现理论的自治,还需充分考量理论阐释适用的中国语境,这也是本文强调内容创作者的平台化中国语境之缘由所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是通过文本分析,筛选研究对象,后期主要采取参与观察与质性访谈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研究起始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首先,文本分析,筛选研究对象。笔者以“自媒体”“推广”“恰饭”等关键词分别在B站、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今日头条、百家号等平台进行文本搜集,共收集到315份有效文本,初步分析后发现大量营销洗稿内容,且雷同度较高。这些文本多为以如何入门自媒体、展示做自媒体营收、介绍自媒体创作者依托平台及内容类型、自媒体创作者背后的艰辛等为主,且文本内容简单,多为博主的主观简单评论,故需要根据主题进行重新筛选,选取具有一定反抗平台行为的内容文本,以契合论文主题。最终选取了100个文本进行详细分析,限于篇幅,仅列出其中前20份文本的简要分析,为保护隐私,均作匿名化处理,详见表1。

表1 100份文本中的前20份文本分析节选

序号	名称	平台	标题	播放量 (万次)	重点内容
1	JDSJ	B站	自由职业四年总结:从北京搬到杭州,我们的生活有哪些新改变	3.9	身体抱恙,搬离北京,重新学习找回初心
2			自由职业三年:从濒死到重生,JDSJ的内容创业故事!	5.6	为了推出新课程日夜颠倒,对观众评论感到焦虑,开设淘宝店卖拍摄配件
3			极地 vlog. 143 我做自由职业者的这一年:收入状况、得失、焦虑与梦想	37.7	兴趣变为职业的契机,内容变现广告收入
4	BHXM		千万别被腾讯黎明计划骗了	761.7	腾讯黎明计划盗用创作者内容进行擅自发布
5	LLKS	B站	320份问卷,告诉你UP主们的真实心理现状	464.4	创作者创作动机和身心焦虑
6			揭秘向 什锦区 up 主会收到哪些商单邀请?	75.8	创作者收入来源
7			全程实录! 2年全职UP主还能找到工作吗?	167.7	灵活就业后的发展
8			知名UP主停更后去哪了? 他们的回答出乎预料	159.4	内容创作者停更后的发展
9			UP主做视频常用的强力技巧,你见过几个?	82.6	如何获取更多流量
10	SSSY		【干货】关于博主,如何报价 & 变现 从定价到收款·事无巨细·坦诚分享	3.5	如何和品牌报价,商业平台的佣金
11			“如何实现 vlog「自由」?”记录生活的意义 平凡的一天 思考与成长	2	自媒体创业方式和拍摄教程
12	BSFPS		【vlogmas】011 看看我做了哪些新品	1.7	淘宝店铺的引流方式
13			【vlogmas】网红淘宝店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的金钱观/对于大学生理财建议	7.3	由内容转向淘宝店的收入支出
14	YT	抖音	普通人做博主的真实收入,想做博主的姐妹看过来	2.5	开商品橱窗,观察哪个领域收入高进行转型
15			自媒体干货普通女生做一个赚钱的博主需要哪些准备	0.2	无技术门槛的软件推荐
16	YDZBKC		创业 创业思维 短视频干货	0.4	转型做自媒体前是专业编导
17	GGDYJSH	西瓜	河南姑娘做自媒体一年,首次公开收益,这个数字让老公有了动力	12.1	明确账号定义,介绍平台创作者激励计划
18	ZBS		30s,4个镜头、20w赞,他们的短片是怎样做到的	287.4	拍摄镜头和脚本的介绍
19	XYEDXW	头条	亲身体验9大自媒体平台,这3个最适合新手,0(零)基础也能写作变现	0.03	不同平台的体验经历分享
20	KGZMT		究竟什么是自媒体? 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媒体? 人人必备,大势所趋	0.03	自媒体是实体经济转电商经济的趋势

其次,参与观察,确定研究对象。根据内容领域和粉丝量区分研究对象,再根据其是否应答,确定了15位研究对象,详见表2中编号为A01~A15访谈对象,观察创作者小号并经授权加入内部或粉丝交流群。例如对A02的微博小号进行实时关注,并加入其店铺粉丝群,了解A02如何将粉丝引入私域流量进行变现;在A10的推荐下,研究者加入百家号创作者交流群,在群里观察创作者对于平台审核制度的评价及作出的反抗举措。

最后,质性访谈,进行主题研究。基于疫情原因及访谈便捷性,笔者采用微博私信、微信语音等方式进行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30~60分钟。笔者于2021年10月—2022年3月,访谈了15位不同平台内容创作者,访谈样本按照不同垂直领域,涵盖高层、中层、底层等不同层次选取。考虑到不同平台与内容创作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可能存在差异性,笔者于2022年5月25日至6月6日追加了7位访谈对象,以全面涵盖文本分析中涉及的不同平台,为保护隐私,均作匿名化处理,详见表2。

表2 22位平台型内容创作者受访者概况

编号	访谈者	平台型媒体	内容创作领域	性别	粉丝数(万)	访谈时间
A01	MY	微博	日常生活	女	7.9	2021-10-07
A02	QMYD	微博、B站	日常生活	女	50.2/26.3	2021-10-15
A03	YQJX	B站	日常搞笑	女	72.6	2021-11-02
A04	CR	微博、B站	日常搞笑	女	18.5/24.6	2021-11-03
A05	QH	B站	日常生活	女	10.8	2021-11-16
A06	JDXSJ	B站	知识分享	男	40	2021-11-22
A07	XL	B站	知识分享	男	260.7	2021-11-30
A08	XG	B站、西瓜视频	日常生活	男	408.3/379	2021-12-12
A09	CC	微信公众号	经验分享	男	150	2021-12-20
A10	LDS	百家号	时事点评	男	30	2022-01-05
A11	ZDYDN	百家号	时事点评	男	20.3	2022-01-08
A12	WGC	百家号	时事点评	男	1	2022-01-18
A13	JGBCF	抖音	美妆测评	女	56.2	2022-01-26
A14	LYR	西瓜视频	时事点评	女	0.4	2022-02-08
A15	LT	西瓜视频	时事点评	男	501.2	2022-03-07
A16	XMT	微博	日常生活	女	7.8	2022-05-25
A17	SYL	B站、小红书	日常生活	女	10.9/2.4	2022-05-26
A18	ZQ	抖音、小红书	日常生活	女	10/0.4	2022-05-26
A19	YJ	小红书	经验分享	女	0.2	2022-05-28
A20	NNN	微博、B站	日常美食	女	107.2/109.5	2022-06-02
A21	LLL	抖音、小红书	生活探店	女	23.6/0.2	2022-06-02
A22	XJZ	抖音、小红书、微博	日常生活	女	2.4/0.3/0.5	2022-06-06

本文视斯科特理论体系为理论旅行,但在“劳动同意”机制研究部分并非完全以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体系为理论框架进行阐释,而是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创造性借用,其目的是从中发现内容创

作者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表面潜伏的“日常反抗”意蕴。在日常反抗路径分析上,本文则通过经验材料运用与斯科特理论阐释的相互穿插,力图以斯科特的日常反抗理论框架阐释内容创作者的反抗行为,实现与斯科特的理论对话,进而将内容创作者视为考察平台资本的剖面,将其提升至国家治理层面,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四、合谋、遵从与策略: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

(一)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

斯科特指出公开剧本是统治精英的自我描绘,利用强势的权力迫使别人进行某种表演,其目的是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自我描绘要有力量,就必然需要为其认定的利益做出一些让步^[37]。互联网用户在平台留下的数据,可作为平台构建良好生态的原始生产材料。平台为鼓励内容创作者进行生产,必然要施行创作者激励计划,以雄厚的平台资本回馈创作者的资本收益,通过放大头部内容创作者的名人效应吸引更多用户进行内容创作,这种“合谋”行为,可为平台获得源源不断的平台资本增值资源。访谈者中共有10位内容创作者表示,最初是因为爱好开始进行内容创作,后续平台开始有奖励机制后,内容创作的频率会提高。“一开始我没想通过发视频赚钱,只是想着记录生活,并且平台也是这么鼓励的,就当是有一个免费的地方给自己生活存个档。”(A14)“灵活就业”“内容致富”等公开剧本构成内容创作者对平台劳动的同意,并逐渐与平台形成了劳动关系,平台对创作者的劳动控制和规训也隐藏在内容创作者劳动中。

公开剧本因其妥协迁就的腔调,通常为支配性价值和话语所具有的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37]。在算法逻辑的“公开剧本”中,流量投放只与内容优质与否挂钩,从而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机会平等的内容生产和选择标准。尽管内容创作者的收入会因为所处等级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内容创作者仍然相信勤奋、不停地创作,就能弥补这种差距。相对于获得同等的收入,劳动者更重视劳动中名义上的“程序正义”,从而对平台组织和数字劳动呈现出认可和忠诚^[5]。在这场权力关系中,创作者作为从属群体,支持那些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平台规定,“他们甘愿受支配,甚至满怀激情地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充当合作者”^[37]。

尽管公开剧本不完全是谎言和欺骗,但其中所包含的话语势必是不平衡的。平台通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从属者利益的话语(如抖音的“记录美好生活”),将内容创作的权力从专业技术人员让渡给普通用户。“别的工作薪资基本都和学历挂钩,像我这种初中学历一般很少有高收入的工作。后来朋友介绍做百家文章,现在我运营百家账号的收入,是外出打工所不敢想的。”(A10)但实际上这类话语是平台资本的修辞性让步,为避免掌权者与从属者产生冲突,提供了一个充分阐释的空间而已。

正如斯科特指出:支配者的“公开剧本并非是故事的全部”,经常表现为宣传和展示^[37],创作者与平台的劳动关系在短期内基于双方的利益达到某种“沉默的合谋”。平台资本独特之处就在于集合了就业者和用工者,并提供了一个灵活就业的形式^[8]。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时间、空间,凭借兴趣和爱好生产内容,通过平台激励金或与商家合作赚取劳动费用。但这种非正式工作,会使创作者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再加之平台的投放机制只有少数头部内容创作者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大多数内容创作者经常会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窘境。作为平台从属群体的内容创作者在利益驱使下对公开剧本进行潜隐式反抗,做出诸如避开平台对广告投放的监控,降低内容质量维持稳定收入,甚至是转移生产内容的平台等日常反抗行为。

(二)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

斯科特认为支配者与从属者的支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加固、维护和调适,才能维持支配关系的发展,这就需要对权力的展现和实施进行支配关系的符号化运作^[37]。

对平台资本而言,通过引入双方可见的“情感赋值”正是这种支配关系符号化的重要运作手段。内容创作者通过创作分享自己的生活或想法,可以在平台上直观获得粉丝互动、好评等正向反馈,感受到自身价值和满足感,这种经由情感劳动进行的情绪化印象管理即为“数字灵工”劳动“同意制造”的重要前提——情感赋值。“从大学时期,开始运营账号,一开始是为了逃避现实,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后来视频出来后得到一些外界肯定,这支撑着我可以一直做下去。”(A07)“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视频收获到上千的弹幕,那时候是真的开心,有种终于被看到的感觉。而且有意义的也不再是播放量这种数字,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可自己的观点和内容。”(A06)

然而这种情感赋值对于劳动者而言不一定都起着推动作用,因为情感赋值的公开化和可见性,“有助于展现和强化某种等级秩序”^[37],内容创作者的经济收益与情感赋值挂钩,使得内容创作者遵从于平台“公开剧本”的权力关系,反而会因为用户及平台的评价,产生焦虑状态并自发加速进入超额的赶工劳动。根据B站UP主-LKs-对320位UP主创作心理状况的调查,72.2%的创作者会积极看私信和观众评论,其中16.6%还会去其他平台进行高强度自搜^[45]。“当粉丝关注数量上去后,你就会对内容策划特别小心,害怕发布的内容会不会让粉丝失望。”(A11)在进行内容创作时,只有16.5%的创作者不感到焦虑,52.34%的全职创作者会经常处于非常焦虑状态^[45]。“预估时间和实际所花费的时间还是有差距的,本来计划一个月出的课程,后来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完成。那段时间休息时间很少,坚持不下去就会去翻留言,观众的催更和期待,让自己没有办法,只能马不停蹄进行下去。但是又会害怕让他们失望,从而陷入一种又焦虑又失落的情绪中。”(A06)

与此同时,平台对内容创作者实现了不在场控制,技术模糊了上下班时间的边界,流量机制重塑了内容创作者对假期的定义。在访谈者中,粉丝数超过10万的内容创作者都表示出自己会因为内容更新感到焦虑,并且为了产出内容常常忘记休息,60%的访谈者一天创作时长为6~8小时,并在节假日和周末仍保持内容更新。“节假日和周末是平台流量的焦点时刻,肯定要保持更新的。工作时间过长这件事,当专心投入内容生产就会忘记时间,常常为了想一个好的内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不是家人过来送饭,都不知道已经过了一整天。”(A09)这就意味着内容创作者作为劳动主体所生产的劳动商品不仅是内容,更是永远处于“待机”状态的眼睛、脑力和所花费的时间^[8]。身心焦虑和自发过劳导致创作者心理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A08曾在视频中表示因为长期收到观众的恶意外评论,以及视频创作的压力导致自己患上轻中度复发性抑郁症。除了心理状态,47.8%的内容创作者还会产生脖子、肩膀酸痛等生理疾病,甚至会因为自发赶工导致作息混乱。在身心焦虑的共同作用下,40.63%的内容创作者对自身频道创作会感到迷茫、悲观的看法,然而,只有18.75%想过彻底停更,放弃创作者的身份^[45]。

但是,内容创作者的身心焦虑和过劳状况基本潜隐于“后台”,只是日常反抗的“潜隐剧本”,流行于自己圈子内,既不想让粉丝看到,亦不会主动展现给平台,以免影响情感赋值的输出,进而影响自身的创作收益,正如斯科特所言:“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利的情境中——经过精心设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35]。

(三)策略:默认伪装正义的“算法控制”

尽管支配者的“公开剧本”表现为宣传与展示,但支配者知道这只是一场表演,可靠性会大打折扣。支配者需要找到一种“伪装和监视”机制来扮演权力关系^[37]。为此,平台通过引入了去中心化的“流量制”竞争机制,将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内化为“流量考核”,在流量的“公开剧本”中,播放量、点赞量和收藏量等可量化的数据成为评估薪酬的标准,制造了某种同意的表象。“在互联网环境下,不存在说特别好的内容被淹没,做出足够优秀的内容,之后都是可以为大家看到的。”(A07)然而,去中心化的算法控制实则是一种伪装的正义,平台使流量投放处于算法黑箱中,宣扬程序公平、机会平等的同时也加剧了内容创作者的竞争。平台资本增值的原始动机,只在乎哪些内容能带来更大的商业

价值,并不会考虑劳动主体即内容创作者的现实权益与未来保障,因此,“公开剧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37]。至于所谓的公开剧本,都是掩蔽在平台劳动控制之下的幻想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算法审查是平台控制内容的另一种“伪装和监视”机制。平台采用信用分的机制规范内容创作者的产出,内容创作者会因内容违规被平台扣分,导致部分发布权益以及内容收益受到影响。尽管各个平台方在内容创作者中心都有明确条款标明内容创作者违规行为的种类和具体情形,但是判定是否违规仍然是由算法黑箱的平台方决定,算法审查成为判定创作者信用分增减的决定方。当算法审查出错时,创作者会根据系统判定的扣分原因,到平台申诉渠道进行申诉。对于作为掌权者的平台而言,平台构筑了技术的高墙,因为有权者的“潜隐剧本”代表的是统治的实践与主张,它也是不能公开宣布的^[37]。情侣博主 A22 因为有亲吻视频被平台算法视为“危险行为”,申诉过程异常艰辛。“我男朋友就很生气,当时一直找客服,客服就说没有办法。当时他搜索抖音上类似的申诉攻略,有人找客服讲了几十分钟就过审了,而我(累计)讲了十几个小时。”(A22)平台方提供的申诉种类有限,除了因被判定为内容抄袭可附上原创证据有可能胜诉外,其他由于算法判定图片质量不高、内容重复性强等扣分行为,只能将内容重新下线,或进行修改后重新发布等方式对内容进行修改。“我当时真的很痛苦,就是我发出5分钟后就被关,我必须重新做一个视频发布,平台才有可能给你通过,不然它会识别说视频同质。”(A22)并且系统已经扣除的信用分,并不会因为删除内容而撤销处罚,只能通过发布其他优质内容进行信用分恢复。

虽然平台算法使内容创作者处于无力反抗的地位,但技术在重塑数字劳动关系的同时,内容创作者作为能动的劳动主体只是将平台的算法伪装与监视视为一种平台掌权者的表演策略,在平台之外对平台算法调用“反向调适”策略,即内容创作者默认平台通过流量投放对其进行控制,又试图通过技术漏洞,习得平台投放规则,积极获取更多流量。“只要从属群体不能可靠地、完全地渗入有权者的潜隐剧本之中,他们就不得不根据有权者在公开剧本中呈现给他们的权力文本(the text power)去进行推测”^[37]。为此,内容创作者根据平台技术赋予内容生产的秩序和规则进行“反向适应”,调整自身以适应平台的秩序和规则。例如除了传统与品牌商进行广告推广合作,内容创作者通过开设淘宝店、电商直播等方式,避开平台的利益分成,通过私域营销构建自己的商业流量。

五、伪装、行动与破界: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路径

(一)伪装:“潜隐剧本”的日常反抗路径

斯科特认为从属群体为了使其抵抗迂回地潜入公开剧本之中,会采取各种伪装方式。最基本的伪装技巧包括匿名、委婉、发牢骚^[37]。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匿名是常见的伪装方式,例如百家号创作者会创立同领域创作者交流群,针对平台最近的热点话题和投放规则进行个体、小群体乃至是较大规模群体的抗争,这些网络社群游离于平台之外,且往往以匿名的身份存在,难以追究到具体的个体。当然,“潜隐剧本”是位于后台对公开剧本的反抗,文本的具体阐释需要结合行动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才能成功建立。对内容创作者而言,通常会存在某种相当广泛的后台社会,为他们对平台权力形成某种共同批判提供了隐蔽的阐释空间。内容创作者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伪装方式:

一是开小号,谨慎出入平台的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伪装技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信息得到伪装的技巧;二是使信息发出者得到伪装的技巧^[37]。开设微博小号是创作者屡见不鲜的“伪装信息发出者”之技巧,既是为了与粉丝互动获得更好的宣传,也是以伪装的方式逃避平台对微博推广内容的监控。“如果今天要发一篇广告推广,我一般都会在微博小号和粉丝提前说明,毕竟转发和评论也是要评估的。”(A01)互联网的流量计算制度,催生了“人工刷阅读量”或“购买流量”的行为,品牌方依照推广内容的点赞、评论和阅读量等流量作为推广效果的考核标准,部分内容创作者便会利用小

号发送粉丝红包、购买“粉丝头条”或在粉丝群里呼吁粉丝去帮忙刷数据。除此之外,内容创作者还用小号检测小红书的限流问题。“你可以拿小号去检测小红书限流,去搜大号的笔记内容,如果你翻几下都找不到自己的账号文章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是限流了。”(A17)从属群体必须找到某些方式让其信息得以顺利流通,同时又使其看似符合法律规定^[37]。这样的伪装方式,才能谨慎进出平台的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之间,遵循的是“风险最小的反抗原则”^[35]:一是可以满足品牌方的推广要求;二是提高平台算法分发的概率,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当然,也面临小号被“炸掉”(被平台关停)的风险(比如笔者长期关注的A16小号)。

二是敏感词处理,再次潜入平台的公开剧本。算法审查是平台掌权者的“沉默的监控品”^[37],使得平台与内容创作者的权力关系和内容评价变得持续可见。如果有敏感词或者商业推广的内容,平台方会限制投放流量,导致内容创作者的生产内容无法被推送给更多受众,内容创作者就会使用表情符号、拼音、缩写等敏感词处理方式,重新呈现内容,以实现再次潜入平台的公开剧本之中,这正是斯科特所说的“隐晦含蓄的方式引入了公开剧本之中”^[37]。12名访谈者在内容创作时都遭遇过因为敏感词或敏感内容存在,导致内容推广受到限流,甚至无法通过审核的状况,“采用一些替代的词语,比如优惠券,就打成英文的‘优’,‘惠’打成一个拼音,券就用‘emoji’的那个圈圈。”(A16)相比于抖音、小红书等其他平台,百家号的审核中尤为严格。“百家的审核和查重要求很高,重复率过高,或者内容被评估质量不高都会被限制投放流量。”(A10)在笔者参与百家号运营时发现:平台审核机制无法辨别图片的特意模糊化处理,判定图片质量不高同样会导致推广受限,并且会对文章进行下线处理。因此创作者就需要不断探索平台公开剧本中的审核机制,以缩写、表情符号等方式避开敏感词,甚至辅助其他工具,将文章进行敏感词筛查再上传至平台。

三是绕道“恰饭”,完成私域营销的潜隐剧本。斯科特指出:日常反抗不承认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并且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35]。这种物质获取的收益被内容创作者形象地称之为“恰饭”,这是对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回馈,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平台激励金、商家合作和产品推广。平台激励金一直是不同平台推崇与内容创作者分红的“公开剧本”,比如B站的“花火平台”,抖音的“巨量星图”,微博的“广告共享计划”,但这种分红是随着平台资本的发展不断调整,分给内容创作者的并不多。“我基本上没有在平台找过广告商,基本上都是私信我,但是我们的合作完成还是建立在‘花火’上,我觉得(B站激励计划)这个比例可能就是小到可以忽略的那种程度。我感觉能有总收入的1%都不错了,就是这么离谱和夸张!”(A17)“任何一种劳动控制或工资支付方式,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可能会导致其特有的安静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35]。为了增加推广收入,内容创作者利用平台漏洞绕道“恰饭”,直接与商家进行交易,以避开平台的高比例抽成。“走平台和不走的报价是不一样的,平台的合作通常会抽成10%~15%,不走平台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提价,同时直接和商家对接到账时间也更短一些。”(A05)

而对于全职进行创意生产的内容创作者而言,除非是头部用户,仅凭以上三种收入“恰饭”其实不比以往上班的工资高。内容创作者往往从创意内容生产转向电商营销,成为内容创作者进一步变现的重要途径。“每个月的收入只能由流量决定,这种不确定性让我曾经萌生想回去上班的念头。后来开了家美妆店铺,收入才稳定些。”(A13)“以前就想自己开家淘宝店,现在开始做视频,还可以利用视频做后续宣传一箭双雕,挺好的。”(A02)当创作者绕道平台进行私域流量“恰饭”时,会以较为隐蔽的方式附上自身微信或淘宝店链接,避开平台广告投放的规则,将经济收益转移至私域流量中,由此完成了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经常性反抗”^[35]。

(二)行动:“自助游离”的日常反抗路径

潜隐剧本并不只是幕后的抱怨和牢骚,它是通过一系列脚踏实地、低调谨慎的策略做出的实际行动,这些策略旨在使剥削最小化^[37]。移动终端的发达,内容创作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平台任务进

行劳动;再加之平台多元化竞争格局的形成,内容创作者根据流量和奖励程度,在不同平台进行灵活选择,形成择平台而栖的“数字牧民”^[8]。根据《Quest Mobile 2021年跨平台 KOL生态研究报告》,跨平台进行内容生产成为当前创作者的主要趋势,双平台布局高达 67.1%^[46],在访谈者中 8 名内容创作者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台进行内容更新。“一开始是在今日头条进行内容更新,但是头条的审核标准越来越严,并且它给的奖励金也越来越少。相较而言,百家号、企鹅号还处于红利期,我就把更新重点都放到这两个平台了。”(A10)“我用抖音平台的游戏解说积攒人气,然后开了微博和小红书这两个平台,在小红书上接广告,在微博上分享日常。”(A18)这些反抗形式与斯科特所说“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35]的农民日常反抗十分类似,只不过内容创作者选取自助的形式更加多样,形成了“哪里有红利就往哪里走”的自助游走模式,以减少或拒绝平台对自己的索要。

首先,头部内容创作者的主要自助方式是在不同平台游离。位于头部内容创作者,可通过与其他平台签署专属合约,转移自身流量和粉丝群体,他们的反抗相较于底层创作者更具有成效。“西瓜视频刚开始的时候就邀请我入驻,不过前提条件是停止在其他平台进行内容更新。由于开的薪酬还不错,我就在其他平台发了声明,以后只在西瓜进行独家播出。转移平台实际上会消磨一部分粉丝,虽然大部分粉丝在一开始会追过来,但长久来说还是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A15)

其次,非头部内容创作者的主要自助方式是在自媒体与工作之间游离。腰部和底层的创作者限于等级,能选择的自助方式更多在自媒体与工作之间游离。“我只会把自媒体当副业,我的小红书数据属于大起大落得比较厉害的那种类型,有可能是选题问题,也有可能是限流问题。”(A19)“白日梦写真馆还是有做的,目前可能我的重心是在自媒体上面,但主要是为了宣传我的白日梦。”(A21)

因此,创作者在选择平台上拥有的主动权,与自身所处等级高度相关,显然内容创作者的等级划分是平台掌权者在“公开剧本”中展现和强化的等级秩序,通过平台的每一次可见和公开的动态变化,都是斯科特所说的“某种符号性姿态”^[37]。然而,创作者的内容生产和传播途径始终需要基于平台,即使可以在不同平台进行自助游离,以获得更多的流量和收益,但平台与创作者的劳动关系不变,因为,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在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35]。即便是在工作自媒体之间游离,选择平台,就意味着创作者仍然无法逃脱平台实施的资本增值和劳动控制。

(三)破界:“联合分享”的日常反抗路径

在权力负载情境中进行印象管理是从属群体关键性生存技能之一^[37]。面对公开剧本的权力负载,抗争主要依托于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等非正式组织或传统社会关系^[37]。这种反抗在内容创作者的破界行动中尤为明显。

一是进行社群联合“避雷”的集体破界反抗。斯科特认为集体性的文化表征是伪装的精致形式,这种伪装的前提是不会宣布直接反对支配者所认可的公开剧本^[37]。为了防止平台限流、算法审核、推广分成,内容创作者往往通过同类创作者网络、朋友、亲属进行“联合避雷”,以打破平台掌权者设立的“公开剧本”边界。“朋友把我拉进一个专门做百家自媒体的群,里面会分享一些最近的热点话题还有需要避开雷区。比如有段时间政策影响,里面的群友就会互相通知最近更文需要尽量避开财经类。”(A11)

二是进行经验分享“避雷”的首次公开宣告。内容创作者们亦在平台积极发布“自媒体经验分享”“播放量与收益不均衡”等内容,解释平台媒体不公正的流量规则和不正义的劳动剥削问题。根据“自媒体收入”“自媒体运营”等关键词进行文本搜索,笔者在 B 站搜索到 1960 条结果,其中包括部分头部内容创作者进行的经验分享,这种潜隐剧本的首次公开宣告正是内容创作者的纵情狂欢和公开满足^[37],哪怕带有随时被封杀或屏蔽的可能性。

斯科特在有关权力关系与话语的观察中早就发现,其绝大多数非睡眠时间都耗费在权力负载情境(power-laden situations)之中。在此情境中,任何一个错误的姿势或口误都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37]算法推荐带来了权力负载但并不意味着日常反抗的消失,“算法已深度嵌入社会知识生产,算法技术作用于日常生活的现象背后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坍塌,算法安置了一个权力负载的真实性体制,让人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反思自身,但人们的行动与反身性并没有完全消失”^[47]。内容创作者的反抗社群虽然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亦不太可能发动正式大规模的反抗行动,且发布的内容始终受到平台限制,随时有下架内容、用户账号被封锁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社群联结所形成的日常反抗是毫无意义的,在长期的博弈关系中,这是维持内容创作者与平台围绕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的“边界或界限进行的不懈斗争”^[37]。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平台化的中国语境,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理论重新阐释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认为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伪装正义的“算法控制”,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然而,内容创作者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潜隐着其对劳动收益的追求、身心焦虑以及避开平台的反抗意蕴,主要表现为伪装、行动及破界三种日常反抗路径:一是内容创作者采取“开小号”“敏感词处理”和“绕道恰饭”方式,进行“潜隐剧本”的伪装艺术反抗实践;二是内容创作者选择“不同平台游离”和“工作与自媒体之间游离”方式,进行自助游走反抗行动;三是内容创作者通过“社群联合避雷”和“经验分享避雷”方式,进行“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的破界反抗行为。

整体而言,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差异不大,但其日常反抗路径尚有一定区别:一是在“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路径上,微博开小号较为普遍,且主要是为了避开推广内容监管;小红书开小号主要为自测限流功能;敏感词处理是内容创作者的普遍做法,百家号审核较为严格,这也导致其敏感词处理要远高于其他平台;平台激励金、商家合作和产品推广是头部创作者常见的三种“恰饭方式”,商家合作是其绕道的主要方式,而非头部创作者则往往以较为隐蔽的方式附带微信或淘宝店链接进行“私域恰饭”。二是在“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路径上,头部内容创作者往往通过与其他平台签署专属合约,转移流量和粉丝;非头部创作者限于等级,更多在自媒体创作与工作之间游离。三是在“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路径上,无论是头部还是非头部内容创作者,均会采用社群联合避雷的集体破界反抗,进行经验分享避雷的首次公开宣告。

尽管斯科特的理论体系能够阐释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底层农民与本文的内容创作者亦有较多的共通之处,但两者在生存伦理问题、日常反抗形式、“剧本边界”破除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理论话题。

一是生存伦理问题已从普适性转向灵活性。斯科特认为“赛达卡”穷人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意识到公开反抗的代价和结果的不理想,转而采取“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这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揭示的东南亚农民力图规避风险,选择回报低但较稳定的“生存伦理”极为类似^[10]。然而,在平台社会,内容创作者尽管具有底层从属者“生存伦理”的普适性,但其生存伦理的“灵活性”要远大于底层农民。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较多的内容创作者只是将自媒体看成副业或积累原始资本的创业尝试,在明显感觉到生存压力时很有可能直接放弃“数字经济”,转向“实体经济”。“本身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让我百分百全职获利的一个职业,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A16)“对于我来说,要有本金。如果做自媒体,肯定会比打工筹备本金的时间周期更短,(这样)就可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做更想做的事情。”(A17)“就是只会把自媒体当副业那种。有可能会接一些活。这其实是我以后工作的一个加分项。”(A19)这显然是平台赋予内容创作者“弹性”劳动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为创新型劳

动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二是日常反抗差异已从消极争斗转向积极争斗。底层农民针对掌权者持续争斗的日常反抗形式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35]。其反抗形式大多数带有明显的消极争斗色彩,比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或者行为本身具有较明显的消极意义,比如偷盗、纵火。这当然与底层农民的生存境遇有关,使得他们需要采用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的方式。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农民的日常反抗在本质上基本类似:都是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一般不公开、无组织地进行抗争。但是,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更多是游离于平台之外的抵抗,即通过在平台之外的其他平台建立社群、寻求帮助,诸如绕道“恰饭”,社群联合,而且其反抗行为更为积极,即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物质收益而采取更加积极行动,而非偷懒、开小差、怠工、装傻卖呆,以至于内容创作者感受到为争取物质收益带来的“身心焦虑与疲惫”。相对于底层农民关注“留下了多少”,内容创作者更多关注“得到了多少”。这或许是因为底层农民一直是掌权者索取的直接对象,支配者对其的索取往往是简单直接的物质索取,索取后的“存量”显然是日常反抗行动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平台对内容创作者的索取往往是复杂间接的数据索取,索取后的“增量”显然是日常反抗行动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旦收益“增量”放缓或停滞,就有可能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开反抗事件,譬如近期爆发的“B站UP主停更事件”其主因之一正是“平台收益减少,收支难以平衡”^[48]。

三是“剧本边界”破除已从农民的底层政治转向平台的国家治理。斯科特的“潜隐剧本”带有深刻的底层政治意味,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可以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37],遵循的是“风险最小的反抗原则”。然而,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却带有明显的“数字痕迹”,内容创作者不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而且还是平台追踪行为轨迹的数据资产,这种数字留痕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容创作者更加重视日常反抗形式,且还要能够在平台的“公开剧本”与自身的“潜隐剧本”之间来回穿梭,巧妙避开算法审查、数据监视、平台控制施加的“惩罚性权力”,减少被平台技术“盗猎”的风险。然而,在斯科特笔下,政府对权力的监管始终没有出现,《弱者的武器》揭示的是小农与农场主的贫富斗争^[49];《支配与抵抗的艺术:潜隐剧本》探讨的是农村阶级关系中支配者与从属者的权力关系,两种“剧本边界”的破除存在明显的难度,这显然与作者长期坚守的“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研究旨趣有关。在平台社会,平台构筑的“算法黑箱”“围墙花园”意味着权力的不断增强,在某种意义上,平台对外宣传的“公开剧本”绝不会轻易公开其“算法”和“花园”,平台通常以“商业机密”和“连接安全”为由,将“算法”藏匿,成为秘而不宣的平台“潜隐剧本”,而“围墙花园”则在平台“公开剧本”中被宣传为“生态系统”,平台通过“连接一切”的意识形态,暗地进一步加固“围墙花园”。

可以说,内容创作者的反抗会成为加剧平台资本控制的试验品,越是反抗,受到的审核就越严格,使得内容创作者即使能够不断地在不同平台进行迁移、切换,进行“平台摇摆”^[50],但始终无法跳脱平台“围墙花园”构筑的资本增值闭环,陷入平台资本操纵的循环中,不能自拔:弱者的武器愈发式微,抵抗的剧本则藏得更深,若不打开算法的“黑箱”,拆解花园的“围墙”,则无法破除平台看似合理的“公开剧本”与内容创作者劳动苦难的“潜隐剧本”边界。这一边界问题突显出国家治理平台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亦是本文为何要强调从中国平台语境出发理解内容创作者的重要原因。

以BATD^①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构筑了互联网治理中的平台层,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权力中心^[51]。在互联网治理中,需跳脱国家与互联网二元对立的思想阻隔,正视“互联网中的国家”以及国家之于传播关系、资源、制度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角色^[52]。

^①BATD 特指百度系、阿里系、腾讯系和抖音系。2022年5月,字节跳动公司改名为抖音公司,故用D指代。

参考文献:

- [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 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2020-11-12). [2023-05-12] <https://www.tioe.tsinghua.edu.cn/info/1109/1801.htm>.
- [2] 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2-02-22). [2023-05-12] <http://www.sic.gov.cn/News/568/11277.htm>.
- [3] Quest Mobile. Quest Mobile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启示录(二)(2022-01-18). [2023-05-12] <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218>.
- [4] 牛天. 赋值的工作: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2021,4:5-13.
- [5] 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 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42-58+127.
- [6] 刘战伟,刘蒙之,李媛媛. 从“赶稿游戏”到“老板游戏”: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1:66-85+127.
- [7] 郭于华.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读书,2002,7:11-18.
- [8] 刘战伟,李媛媛. 自主与妥协: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 新闻记者,2021,8:61-72.
- [9] 燕道成,蒋青桃,陈蓉. 数字劳动视域下的移动游戏陪练:剥削、异化与反抗.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5:60-73+127.
- [10] 李加方,王海璐. 盗版作为“弱者的武器”:马拉维配音(盗版)电影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全球传媒学刊,2020,2:98-117.
- [11] 喻国明,焦建,张鑫. “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120-127.
- [12] A. Gandini.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 Human Relations,2019,72(6):1039-1056.
- [13] P. Sun, J. Y.-J. Chen, U. Rani. From Flexible Labour to “Sticky Labour”: A Tracking Study of Workers in the Food-delivery Platform Economy of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3,37(2):412-431.
- [14] C. Martha, P. Julianne, K. Earl. Manufacturing Discontent: The Labor Process, Job Insecurity and the Making of “Good” and “Bad” Workers//E. H. Gorman, S. P. Vallas. Professional Work: Knowledge, Power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0:221-247.
- [15] M. Curtin, K. Sanson. Precarious Creativity: Global Media, Local Labor.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1-18.
- [16] E. Salamon. Freelance Journalists’ Rights, Contracts, Labor Organizing and Digital Resistance. [2023-05-12] <https://pure.hud.ac.uk/en/publications/precarious-e-lancers-freelance-journalists-rights-contracts-labor>.
- [17] N. S. Cohen. At Work in the Digital Newsroom. Digital Journalism,2019,7(5):571-591.
- [18] P. McDonald, P. Williams, R. Mayes. How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Engage with and Resist Digital Platform Work. New Media & Society,2020,1-22.
- [19] L. Jin, S. D. Duke, L. Shroff. A Labor Movement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1-09-24. [2023-05-12] <https://hbsp.harvard.edu/product/H06KVV-PDF-ENG>.
- [20] V. O’Meara. Weapons of the Chic: Instagram Influencer Engagement Pods as Practices of Resistance to Instagram Platform Labor. Social Media + Society,2019,10(12):1-11.
- [21] E. Papadimitropoulos. Platform Capitalism,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nd the Commons. Rethinking Marxism, 2021, 33(2):246-262.
- [22] L. Cini. Resisting Algorithmic Control: Understanding the Rise and Variety of Platform Worker Mobilisations. New Technol Work Employ,2023,38:125-144.
- [23] O. Lundah. Algorithmic Meta-capital: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Social Power Through Algorithms in Media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22,25(10):1440-1455.
- [24] J. de Kloet, T. Poell, Z. Guohua, et al.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9,12(3):249-256.
- [25] L. Zhang, J. Chen. A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o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Cases of Alibaba and Tencent.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2, 44(8): 1454-1472.
- [26] 刘璐璐.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与数据资本化——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为线索.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404-411.
- [27] 姚建华, 徐德骖.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新闻与写作, 2021, 2: 5-13.
- [28] 张铮, 吴福仲. 创意流水线: 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12: 5-13.
- [29] 何天平. 在公共性和商业化之间: 反思平台型媒体的“流量崇拜”与生态治理. 青年记者, 2021, 3: 16-17.
- [30] 王金红, 黄振辉. 社会抗争研究: 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学术研究, 2012, 2: 41-49.
- [31] 童星, 张乐. 国内社会抗争研究范式的探讨——基于本体论与方法论视角. 学术界, 2013, 2: 45-47.
- [32] 杜红艳. 日常生活的空间规制与人的实践反抗——当代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向度. 世界哲学, 2022, 4: 46-56 + 160-161.
- [33] 程慧敏. 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 3: 153-161.
- [34] 吴鼎铭. 网络“受众”的劳工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17, 6: 124-137.
- [35] 詹姆斯·C.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 郑广怀, 张敏, 何江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前言 1-3; 前言 4; 42; 39; 41; 35; 35; 41; 479.
- [36] 强记研读会. 强记研读会第 N+22 期——《支配与抵抗艺术: 潜隐剧本》(2023-04-27). [2023-09-27] <https://mp.weixin.qq.com/s/0CTc3j1lgrODHqJnXerlw>.
- [37] 詹姆斯·C. 斯科特. 支配与抵抗艺术: 潜隐剧本. 王佳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导读 5; 导读 9; 导读 3; 导读 4; 28-29; 6; 7; 导读 3; 5; 73; 74; 3; 3; 107; 216-217; 217; 217; 75; 216; 296; 74; 4; 导读 6; 246; 317-333; 序言 13; 34; 导读 6.
- [38] 爱德华·W. 萨义德. 世界·文本·批判家. 李自修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00.
- [39] 陆扬. 赛义德论理论旅行.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 104-112.
- [40] 学人. 农民、权力与反抗的艺术——詹姆斯·C. 斯科特访谈录(2021-12-29). [2023-09-27] <https://mp.weixin.qq.com/s/uaJPELtoJnkTqJJuBEeslg>.
- [41] 于建嵘. 对话斯科特——民众反抗与政治(1)(2023-07-26). [2023-09-27] <https://mp.weixin.qq.com/s/ljN-PEN9j-68kuArP87BWEg>.
- [42] L. J. Li, K.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96, 22(1): 29-61.
- [43] K. J.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1996, 49(1): 31-55.
- [44] 于建嵘.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文史博览(理论), 2008, 12: 60-63.
- [45] -Lks-. 320 份问卷, 告诉你 UP 主们的真实心理现象(2021-12-29). [2023-09-2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U4y1F783?spm_id_from=333.999.0.0.
- [46] Quest Mobile. Quest Mobile 2021 年跨平台 KOL 生态研究报告(2022-01-18). [2023-05-12]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205901.html>.
- [47] N. Couldry, A. Fotopoulou, L. Dickens. Real Social Analytics: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 Digital Worl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67(1): 119-137.
- [48] 互联网怪盗团. B 站 UP 主“停更潮”的真实原因(2023-04-03). [2023-05-12]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177964.html>.
- [49] 徐义强. 谷物、定居农业与人类早期国家——詹姆斯·斯科特农业研究的学术进路与思想关怀.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12-23.
- [50] E. C. Tandoc, C. Lou, V. L. H. Min. Platform-swinging in a Poly-social-media Context: How and Why Users Navigate Multi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9, 24(1): 21-35.
- [51] 崔保国, 刘金河. 论网络空间中的平台治理. 全球传媒学刊, 2020, 1: 86-101.
- [52] 洪宇. 后美国时代的互联网与国家. 国际新闻界, 2020, 2: 6-27.

Consent Manufacturing and Daily Resistance of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s in the Labor Process

Li Detuan, Chen Yingy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bstract: Platform capital gives birth to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s characterized by gig work. The tacit "consent to manufacture" surface in the labor process of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s hides the internal sense of resista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ir labor situ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of 22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s,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consent manufacturing and daily resistance in their labor process through Scott's weapons of the weak, open transcripts and hidden transcripts theory of resistance. By conspiring to pursue the "open transcripts" of platform capital, following the "rush labor" of accelerating emotional value, and tacitly acquiescing in the disguised justice of "algorithm control",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s achieve the "consent manufacturing" in their labor process. However, behind it is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pursuit of income and psycho-physical anxiet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aily resistance paths: disguising behaviors resistance of "hidden transcripts", positive actions resistance of "self-help wandering" and breaking boundaries resistance of "joint sharing". Reconsidering Scott's resistance theor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ily resistance of content creators and peasants: the survival ethics of content creators has changed from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weak's resistance to flexibility, daily resistance from the weak passive struggle to positive struggle, and the breaking down of two transcripts boundary needs to shift from the underclass struggle of the weak to the state governance of the platform. Although the creators' "daily resistance" strategy has the potential to dissolve the platform labor control, it still cannot jump out of the closed loop of the platform capital logic and fall into the cycle of platform capital manipulating labor. The "daily resistance" of content creators has always been unable to break away from the "algorithm black box" and "walled garden" of the platform,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state to govern the capital manipulation behavior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Key words: platisher content creator; labor process; consent manufacturing; daily resistance; state governance

■ 收稿日期: 2023-02-08

■ 作者单位: 李德团,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广州广东 510521

陈盈伊,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 责任编辑: 肖劲草